

毕飞宇： 内心干净才会产生好的作品

2013年，文学评论家张莉到南京和毕飞宇用两天的时间做了一场对谈，并形成了对谈集《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再版了此书，并更改书名为《小说生活》。

在这本书里毕飞宇与张莉谈到了对许多文学名家、作品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非常真诚地披露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所经历的的成长之路，他在创作中所遭遇的犹疑、困惑、折磨、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正如张莉所说：“这个小说里面潜藏有一个乡下少年如何成长为优秀小说家的秘密，因为毕飞宇老师写他的创作经验和小说经验以及阅读经验的时候，其实是毫无保留的、完全敞开自我的方式。”

7月25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茅奖作家沙龙系列”第三讲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的作者毕飞宇，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毕飞宇文集系列的责编赵萍，和读者分享了毕飞宇的文学创作之路。

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



作家简介

毕飞宇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代表作品：《那个男孩是我》《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

凭《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得两届鲁迅文学奖。

2011年，《玉米》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2011年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推拿》写了被所有人忽略的生活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初登文坛，在近三十年的创作中，毕飞宇不以高产著称，但他的每一部作品从创作伊始，就被赋予了坚实的质地，折射出毕飞宇文字的一个独特品质，那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坚持和维护。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2015年推出《毕飞宇文集》九卷本，收录了毕飞宇1991年至2013年创作发表的绝大部分小说，力求展现毕飞宇30多年来的小说创作的全貌。

《推拿》首次出版于2008年9月，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谈到茅盾文学奖，毕飞宇说他在写《推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得奖这回事。在他看来，“‘推拿’这个题材不是主旋律的，很边缘，没有历史感和宏大的天问，它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已经不存在的生活，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我把这个黑暗尽可能地拉到阳光底下，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学奖。”

毕飞宇说，《推拿》一书能荣获茅奖，某种程度上也是茅盾文学奖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奖的小说敞开了它们本该宽广的胸怀，它不再只关注宏大的历史题材、史诗模式，现在变得越来越包容。他笑说《推拿》能获茅奖最大的秘诀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图书简介

《小说生活》

在畅销十五万册的《小说课》里，毕飞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外短篇小说中的体格与筋骨，如果你也曾为那本书里发人深省的观点拍手叫好，那么你不更应该错过这本《小说生活》。这是小说家毕飞宇与批评家张莉一次极具激扬的文学对谈，他们从毕飞宇的童年开始谈起，从阅读到写作、从小说到电影，既是读者又是文字的试验者，在真实与虚构的疆域里，一个小说家是如何真诚、热情地探索小说之道的。

不是文坛劳模

记者：《小说生活》是您和张莉的对谈录，对于谈哪些话题，是怎么把控的？

毕飞宇：这本书对我来讲特别容易，大的思路，张莉老师在做对谈之前捋得特别清楚，我甚至都不用考虑聊什么，我就顺着她走就行了。

我聊得很简单并不意味着我对这本书没有要求，我内心是有要求的。我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文学，不是小说，不是哲学，而是具体的那个叫毕飞宇的人，他的文学、他的小说。

它应该是非常具体的文学话题，甚至可以说是跟具体的个人生命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文学，或者个体生命在小说里的具体体验，我们两个彼此挖掘、激发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是小的，我的所有写作目标，起码写散文、写小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小，为什么？因为我的阅读是往大处走的，往更抽象、更广阔的方向去寻找，找到最后，如果一个小说家最后发现人类和人类命运，我说这是一个作家的灾难，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作家。一个好作家让读者最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个人的生命，他的内心，这才是一个作家最牛的事情。否则人家去看哲学史、看历史，看一个作家的诉说干什么呢？

记者：您在《小说生活》序言里有一段话：“在这本书《小说生活》出版的时候，我和张莉有过一次电话长谈，所谈的重点就是这本书的不足。说起我们的盲区，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张莉鼓励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等到毕老你90岁了，我们再谈一次都补上。”还会出下一本对谈吗？

毕飞宇：反正我在70岁之前这样的对话不会再有了。如果老天爷厚爱，我活到80岁，到时候我和张莉再约一下，我们聊得长一点，聊一个月，每天散散步，找一个地方晃悠悠，每天聊两个小时，就一个小话题聊两个小时，我们商量好聊到二十个命题。

记者：您在作家圈里是有名的爱健身，您为什么要去健身？

毕飞宇：我喜欢啊，因为我是太热爱运动的人。我不可能踢足球，一场足球要22个人，小场地也要14个人，到了50多岁的年纪，你一年也凑不齐一回人，你又好动，怎么办？只能健身。

真的不是为了让自己肌肉好看、体型好看，真不是。它可能客观上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我们50多岁的一个老男人，我没有肌肉咋的？我不健身，我把我的书稿给应红老师，应红老师说，不行，这个作家的身材不行，我们不要？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健身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每天在教练严格的指导下把动作做得非常精准，既保证锻炼你的肌体又不至于伤害你的韧带和关节，这都是很科学的东西。

因为我长得比较瘦，脸也比较严肃，长期以来大家谈论起这个作家的话，特别容易把他往文坛劳模的方向去靠，说这是一个文坛劳模。其实中国文坛有两大懒汉，余华和我。大概再也没有人写得比我们少了。原来余华说我写得比老毕还要少一些，但他的《兄弟》体量太大，现在他的字数都比我多一些。我55岁，写了这么多年，写到现在，我的小说字数加起来300万字不到，就这么一点点。



写小说每天都会遇到困难

记者：现在解读诗词这么火，您会不会把唐诗宋词讲给孩子们，有没有这个计划？

毕飞宇：没有。我有一个男孩，他也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一个想法，觉得我儿子诗歌方面的能力特别强，因为他爸爸是一个作家，从小到大不知道他爸爸给他讲了多少首诗词；同时认为他的作文写得特别棒，因为他爸爸是一个作家，他一定在家里面教孩子如何写作文。其实，我没给我儿子讲过一次作文，也没有讲过唐诗宋词。

我始终认为好的作品是好玩的，好的诗歌是好玩的，我只是把我和它玩的时候的状态告诉你。我不太相信别人去解读什么东西，我爸爸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爸爸会背的诗歌比我多了太多，他在我面前对我最大的影响也就是引用，他不给我做具体的讲解。

诗是不能讲的。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我父亲给我讲过一句诗，叫“风吹马尾千条线”，伟大的诗人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好多字你还没有认识，大人读给你听了之后，你能懂。

我不太相信那些幼儿园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诗歌能给孩子讲明白，很可能等五个字和七个字讲明白之后，诗歌没了，这是讲诗歌最危险的地方。

记者：您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毕飞宇：我有一个小说家不遇到困难，写小说的人最后变得特别有耐心，原因在于，他每天几乎都会遇到困难。

他面对什么东西？他面对作品的美学形态。比如说我这个作品渴望激情澎湃，这个作品我渴望意味深长，它始终有一个美学的形态，这个美学的形态最后是由人物、事件推进起来的。

举个现实的例子《玉米》。《玉米》是《青衣》之后写的，《青衣》是很唯美、很忧伤的小说，那是舞台上的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脸上有贴片，眼角是吊起来的，所以它的汉语形态是忧伤、妖娆、绝望、疼痛，那就决定它不能是生活语言，它的美学形态一定是书面的、典雅的东西。

等我把《青衣》写完之后，写作《玉米》的时候，我的语言风格还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时候突然写到玉米的母亲，一个不太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一说话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苏北乡村妇女的调子，句子必须短、必须简单。问题来了，我现在写玉米的母亲，语言形态突然变成这样，可是前面一万多字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我，你该怎么办？

我选择推翻重来，那一万字不要了。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充满焦灼感，所有好东西都要付出巨大代价的。